

一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 岌岌可危的华北河山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继“九一八”侵占东三省后，1933年初又占领山海关和热河。此后它的侵略魔爪进一步伸向华北。

日本帝国主义一向把东北看成是它的“生命线”，把华北视为其侵吞全中国、称霸世界的“圣战基地”。控制华北，对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华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控制华北，不仅可以解除东北的侧翼威胁，巩固其卵翼下的伪满洲国，还可掌握深入中国内地的咽喉要道和北侵苏、蒙的桥头堡。

华北丰富的自然资源更使日本侵略者垂涎欲滴，把华北作为它“以战养战”的重要基

地。日本资源贫乏，国内有限的资源难以满足其日益扩大的战争需要，它采取“以战养战”方针，依靠掠夺殖民地的资源，来支撑侵略战争。华北的煤、铁储量丰富，渤海湾的盐是日本军需化学工业必需的优质原料。农业方面，华北耕地占全国 1/4，棉花产量占全国产量的近半数，粮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 1/3 强。这些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日本在鲸吞东北并拼凑起傀儡政权后，迫不及待地要占领华北；由于它武装侵略中国的行为已遭到英美等国的谴责，它又刚刚宣布退出国联，为免遭进一步孤立，暂不敢贸然发动第二个九一八事变，用武力进占华北；而决定从经济和政治方面染指和控制华北，把国民政府势力从华北驱逐出去，使华北当局绝对服从日本，在政治、外交、财政上脱离南京，进而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

日本侵略者实施这一策略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在 1935 年 5 月发动华北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以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和遵化县长帮助孙永勤部为借口，5 月 29 日向国民党华北当局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包括撤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及日本指

定的其他官吏；取消河北省各地的国民党党部；调走驻在河北省的中央军部队和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等。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交涉后，国民党屈服于日本压力，接受了日方条件。上述河北事件还未结束，日本侵略者又发动了张北事件。日本 4 名特务潜入察哈尔境内绘制地图，6 月 5 日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闻讯后，立即下令释放。但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却以此为借口，向宋哲元提出无理要求，并以武力相威胁。国民党当局再次妥协，同意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官员；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撤离该地；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职。通过华北事变，日本窃取了冀察两省的部分主权，国民党中央势力在华北大受削弱。但是，贪婪的日本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又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妄图使冀、察、绥、鲁、晋 5 省从中国版图中分割出来。密谋策划并卖力推行这一侵略活动的，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关于主持“自治”的人选，日本先后物色了吴佩孚、孙传芳、张敬尧等失意军阀和晋绥绥靖主任阎锡山，但都没有成功。土肥原无

奈，便把目标集中到宋哲元身上。11月11日，他向宋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案”，即宋11月20日宣布“自治”，否则日本将用武力进攻河北、山东。宋哲元态度暧昧。他虽想借助日本势力保持华北的半独立状态，但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出卖国土的千古罪人。土肥原又峻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挂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招牌，宣布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冀东傀儡政权的出笼，是“华北自治”的先声。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当局再次妥协，批准成立了有很大自主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就在日本军人策动“华北自治”的同时，日本外交当局炮制并竭力向中国兜售“广田三原则”。由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并经日本内阁于1935年10月4日通过的“对华三原则”，其主要内容是：中、日亲善，中国不得藉欧美势力牵制日本；中、日，“满”亲善，中国最好是承认至少要默认伪满洲国；中日共同防共。这实际上是让中国一切都听从日本摆布，成为它的附属国。

1936年初日本发生“二二六”政变后，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大量增兵华北。此前，日本根据辛丑条约，在从北平到山海关的铁路沿线驻有军队1700人。1936年4月18

日，日本军部根据内阁决定，将华北驻屯军增加 2 倍以上，增至 5700 人。与此同时，日本浪人在中国各地不断挑衅滋事，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为此，中日两国从 9 月到 12 月进行了“调整国交”谈判。

总之，华北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华北河山行将变色，亡国惨祸迫在眉睫。身处华北前线、富有政治敏感的北平学生深深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旨在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西安事变，就是在这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发生的。

2. 汹涌澎湃的抗日潮流

华北事变之后，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全国人民面前。1935 年 12 月初，何应钦到北平后，为适应日本要求而组建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出笼，“华北自治”的叫嚷甚嚣尘上。受民族危亡直接威胁的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影响下，冲破国民党的压制，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以此为起点，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高潮蓬勃兴起。

北平学生为挽救民族危亡，决定 12 月 9 日齐集新华门前向何应钦请愿，表示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自治”，要求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当天由于军警封闭城门，位于西郊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被阻于西直门外，只好就地开展爱国宣传；城内各校学生冲破军警多方阻挠，齐集新华门。何应钦避居西郊，拒不接见请愿学生，仅派代表敷衍。愤怒的学生遂将请愿改为示威，他们在游行过程中不断高呼：“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华北伪组织！”等口号。在王府井南口，军警用水龙、木棍、大刀袭击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致使学生多人受伤和被捕，酿成惨剧。

当晚，北平各校学生代表集会，宣告成立北平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并决定从翌日起全市罢课。在广大学生“再来一次”的强烈要求下，北平学联决定再组织一次全市性的示威游行，并选定在 12 月 16 日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日子。这一天，按照学联的统一部署，各校学生分四路向天桥进发。学生在冲出校门和行进途中，遭到军警的严密堵截和袭击。各路队伍到达天桥后，召开了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除学生外，还有不少市民。市学联代表、北大学生黄敬站在一辆电车上，发

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会后，学生列队游行，预定经前门大街、天安门广场、东单，到外交部街冀察政务委员会所在地示威抗议。队伍到前门时，正阳门紧闭。经交涉，允许部分学生从前门进城，其他学生从宣武门进城，之后返回学校。当学生队伍到达宣武门时，仍被拒之门外。接着就发生了武装军警袭击学生的流血事件。

一二九运动的星星之火，点燃了布满全国的干柴，抗日救亡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每个角落。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迅速超出了学生界和知识界的范围，形成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

3.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定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号召武装民众，抗日救国。这与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政策形成鲜明对照，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当时统治全党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执行“打倒一切”、

“排斥一切”的错误政策，只提“下层统一战线”，拒绝一切“上层统一战线”。这些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政策，给群众的反日斗争带来不利影响。

中国共产党克服自身的“左”倾机会主义，调整政策，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经历了一个过程。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提出：“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这个宣言的发表，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有所变化，统一战线思想有所前进。宣言在社会上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爱国将领冯玉祥联合中国共产党积极筹建抗日武装，同年5月在张家口举起“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旗帜。但此时中共斗争策略的改变极为有限，“左”倾路线领导者把在三个条件下团结抗日的宣言只是“当作宣传工具，当作反对

各派的武器”，并断言国民党各派绝不会接受这个条件。

“左”倾路线领导者的关门主义政策，还反映在同年 11 月对待福建人民政府的态度上。

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入闽“剿共”失利，决定改“剿共反蒋抗日”为“联共反蒋抗日”。1933 年 9 月，蔡廷锴等派陈公培到闽西红军驻地会见彭德怀。彭向陈解释了共产党 1 月 17 日发表的在三个条件下团结抗日的宣言，肯定了十九路军反蒋抗日行动，同时也批评了他们“剿共”的错误。陈表明了十九路军联共反蒋抗日的愿望。10 月，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徐名鸿由陈公培陪同前往江西瑞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接见了徐、陈。经过谈判，双方签订了“抗日作战协定”。协定签订第四天，中共中央给福州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写信，要求他们利用有利时机，发展统一战线，扩大革命力量；并批评了把十九路军及酝酿中的福建人民政府，与南京反动政府相提并论的错误。可是，当共产国际提出要揭露蒋光鼐、蔡廷锴的反动本质，揭穿其他反蒋派别的真实作用，号召十九路军士兵哗变到红军方面来后，中共中央又回到关门主义的道路上来。他们下达文件，发表社论，攻击福建事变及其

发动者，把福建人民政府看成同南京政府一样，都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闽变是“反革命”；比蒋介石还坏”，是“一切在野的反革命改良主义派别的总和”。这使中共失去了一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自身影响的有利时机。

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并经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1700多著名人士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虽仍有“左”倾色彩，但在统一战线思想上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它放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提出中国人民的惟一出路是“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联合国内外一切反日力量；纲领号召“立刻停止一切内战”，全国“一切陆海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主张全国工农兵学商大联合，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

红军长征前夕，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围剿”，周恩来和朱德派代表与陈济棠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上层统一战线”活动。陈当时是国民党广州绥靖主任、第八路总指挥、进攻中央苏区的南

路总指挥。他与蒋介石历来矛盾很深，担心蒋“围剿”红军得手后会危及他的广东地盘。所以他对红军实行“外打内通”、“明打暗和”方针。他先派代表到瑞金谈判共同反蒋问题，周恩来、朱德又派潘汉年、何长工到陈军驻地继续会谈。经三昼夜谈判，双方达成就地停火、互通情报、互相通商、支援红军军火、必要时互相借道的协议。这次“上层统一战线”的成功，对中央红军比较顺利地突破长征中的第一、二道封锁线起了积极作用。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后来确定党的政治路线、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定，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举行。鉴于当时德、日等国法西斯主义猖獗，大会制定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会议期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政策，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八一宣言》完全抛弃了只

要“下层统一战线”的主张，提出建立包括上、下层都在内的统一战线；它抛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响亮提出“抗日救国”口号；它还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及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等等。《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路线方针开始了新的转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已基本形成。

同年 10 月的《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比《八一宣言》又前进了一大步。这个文件对华北事变后国内的政治形势、阶级关系的变化、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党的策略方针以及统一战线的具体对象、工作方法和领导权等，都作了正确的分析和论述。指示信为两个月后形成的瓦窑堡会议决议提出了基本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形成中的一个里程碑。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在这里的红十五军团会合，中国革命进入新时期。11 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奉命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12 月 17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

议，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2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侵入华北，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祸”，“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上一条惟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决议确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议对统一战线的参加者、组织形式、领导权等问题作了阐述。决议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同时告诫全党要警惕右倾机会主义复活。会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特别是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及其历史表现，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分裂的客观必然性，作了深刻分析，有力地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瓦窑堡会议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但这个决议

仍把蒋介石排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外，此时中共的口号是“反蒋抗日”；直到1936年8、9月间，由“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即“联蒋抗日”，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获得进一步完善。

中国共产党抛弃“左”倾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这对推动张学良、杨虎城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发动西安事变，特别是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南京政府对日政策趋向强硬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实行依赖国联、不抵抗政策；1933年初又实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方针；但结果都是屈辱妥协。直到1935年夏华北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才开始发生变化，由软弱趋向强硬，由妥协变为抵制。

南京政府此时开始改变对日态度，与下述情况有关。日本侵入华北，国民党当局因失土有责，继“九一八”后，再次受到国人的严厉谴责和猛烈抨击；日本在华北大肆掠夺经济资源，猖獗进行走私活动，使中国的关税、财源

大量流失，导致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这些都使南京政府的统治受到威胁；日本侵入华北，再次损害了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它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这种状况对主要由亲英美派掌权的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不能不发生影响。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得手，中央红军被迫退出南方各根据地并在长征中大量减员。蒋介石认为，转移到陕甘的红军余部已构不成他的“心腹大患”，“腹背受敌”的局面已结束，他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者。

对土肥原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南京政府开始采取一定的抵制态度。当土肥原逼迫宋哲元限期宣布“自治”的紧要关头，蒋介石11月20日在南京接见日本大使有吉，拒绝了日方关于“华北自治”的无理要求。有吉威胁说：华北与日、“满”关系密切，南京如不允许华北“自治”，既要遭到华北当局的反对，日本关东军也不会袖手旁观。蒋介石当即驳斥说：“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多是日方策动，中国方面并无此事。”两天后，南京外交部奉命向有吉声明：中国“绝不能承认华北独立之自治运动”，要求日本迅速将土肥原调离华北。25日，南京外交部就一名日军参谋催逼河北省当

局参加“自治”和日人在天津参与并指挥所谓自治请愿团活动照会日本大使有吉，严正指出：“此种不法行为，足以破坏中国统一，危及中国领土主权，中国政府及人民决难容忍”，要求日本当局“对于此等日本军人之非法行为，立予严切制止，并饬令土肥原即日离境，以遏乱源”。殷汝耕在通县刚刚挂出“自治”招牌，南京政府即发出对殷的“免职惩办令”。土肥原在平津猖獗活动，而宋哲元态度暧昧、华北河山岌岌可危时，蒋介石一面派亲信赶往华北，阻止他宣布“自治”，同时向苏皖豫一带增派军队，摆出一付宋如宣布“自治”南京将用武力镇压的架式。后来，蒋介石派何应钦北上，为委曲求全，成立了一个日本有很大影响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但土肥原之流卖力策划的“华北自治”图谋终未得逞。

南京政府对日态度的改变，还反映在拒绝日本的“广田三原则”。蒋介石认为，这三条原则从形式上看似乎问题不大，但从内容上看事关重大，意义深重，实际上它是变相要求中国“脱离国联、承认伪国与联盟对俄”，所以“不得不郑重考虑”。在后来一年多的中日交涉、谈判中，南京政府顶住日本压力，一直没有承认它。

在 1936 年下半年的中日“调整国交”谈判中，南京政府拒绝了日方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些反要求。针对日方要求“取缔排日”问题，张群说：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激起的，要“除去这种恶感，日本方面要避免以武力干涉或高压手段来对待中国”，“须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及行政之统一”。张群强调，只有如此，才能恢复友好关系，除去对日恶感。关于“华北问题”，张群明确指出：中国自身根本没有问题，只因近年来日方造成种种特殊状态，才引起问题。日方不是本着平等互惠的精神进行经济合作，而是要从政治与经济方面造成华北的独立与半独立政权，显然这是破坏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对此，绝无商讨余地。在 9 月 23 日和 12 月 3 日的会谈中，张群根据蒋介石指示，向日方提出反要求：取消“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取消冀东伪组织；取缔察绥伪匪军；停止华北走私活动。他并表示，这是中方“最低限度之要求，均应同时解决”。

在中日“调整国交”谈判期间，蒋介石 10 月 8 日在南京接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对他说：根本调整两国国交，实有必要，“我